

专访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后人向隆万

我们都要为历史作证

81年前的8月15日,穷途末路的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次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史称“东京审判”。中国派出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的专业团队参与审判。

“历史真相不会消失,越还原越真实。”85岁的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的父亲向哲濬,正是当年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从中国代表团如何在“事繁人少”的困境中完成起诉,到一位数学教授晚年追寻父亲足迹的故事,向隆万的讲述,将那段铁证如山的正义之战再次拉近到人们眼前。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冰晶 宋世锋



向隆万教授翻看史料

正义审判 历史回响

如果这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

“父亲比我大将近50岁。”向隆万说。1946年,他还是个刚上小学的孩子,随母亲和姐姐去机场送父亲上飞机,“当时只知道父亲是去审判日本鬼子。”

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受命赴日的中国代表团先后仅有17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代表团70余人,美国代表团百余人,而日本战犯的辩护团更是高达130人。

1946年5月14日,东京审判开庭后不久,日本辩护律师便在法庭上发难,声称珍珠港事变之前中国和日本并未宣战,所以1941年12月之前检方起诉的日本战犯罪行不应被纳入审判。

向隆万对父亲当天的法庭陈词如数家珍:“我父亲第一时间站出来反驳——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一个晚上杀死多少人?卢沟桥事变又是一个晚上杀死多少人?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军民被杀。他反问: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战争?还有什么战争?”

这段珍贵的庭审影像至今留存。向隆万说:“每次看到这段影像,都能感受到父亲那份从容背后的激愤与担当。”

向隆万介绍,东京审判在法律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首先,它确立了“反和平罪”(侵略罪),将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送上审判台,而不仅限于前线作战者。其次,确立了“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即便是执行上级命令的个人,也要为自己的暴行承担法律责任。第三,它打破了仅根据宣

战与否来确定战争状态的局限。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向哲濬依法力争,坚持将起诉起始时间追溯至张作霖被日军炸死的“皇姑屯事件”事发日,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提前了9年,比日军偷袭珍珠港更是提前了13年。最终,国际检察局采纳了这一主张。

中国检察官团队的孤勇之战

“我父亲发给外交部的一封信里就用了八个字——‘事繁人少,听夕从公’。”向隆万告诉记者,这看似简单的八个字,道尽了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审判中的艰难处境和殚精竭虑。

1946年2月7日,向哲濬抵达东京,而4月29日便是提交起诉书的截止日期,留给中国检察官团队的时间仅有两个多月。55项罪状中的每一项,都必须有详实的证据支撑,“起诉书不是空喊口号,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作为基础。”

为了搜集证据,向哲濬一方面不断向国内发电报,请求各部门提供材料,一方面往返于中日之间。同时,大量资料需要快速翻译,也是很大的困难。向隆万回忆起母亲讲述的一个细节:“那时候中国代表团人很少,父亲有时带着中文证据回国,来不及找翻译,就由我母亲念中文,父亲当场译成英文,打字机哒哒哒打到深夜。我晚上常常被打字声惊醒。”

在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搜集上,中国检察官团队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搜集了大量证人证词,最终有8名证人从中国前往东京出庭作证。

然而,中国代表团的困境远不止

人手不足。这些困境,让中国检察官团队的每一次突破都显得格外珍贵。他们最终搜集到大量人证物证,包括德国驻华大使馆发送的秘密电报——作为日本的盟友,德国使馆在电报中客观记录了日军侵占南京后的暴行,这份来自“第三方”的材料成为一份无可辩驳的证据。

从数学教授到历史守护者

1987年,向哲濬辞世,享年95岁。“我父亲生前几乎不提东京审判的事。”向隆万说,对父亲向哲濬在东京审判中的经历,他到晚年才开始真正了解。

令人感慨的是,向隆万并非历史学者出身。他的本职工作是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

2006年电影《东京审判》上映,向隆万受邀参加上海首映式。“媒体来采访我,我每次都感到非常惭愧,实在讲不出什么。”向隆万说,这种“讲不出”的愧疚,促使他走上了追寻父亲足迹的道路。

在父亲同事的指点下,向隆万利用赴美探亲的机会,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机构查找资料。几番求索,向隆万找到了二十多卷纸质庭审记录。通过人名索引,他查到父亲在法庭上有10次演讲。他把这些珍贵资料复印带回国内,翻译成中文,连同母亲的回忆录和当年的部分媒体报道,编成《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于2010年出版。

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2011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纪念日——上海交通大学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向隆万担任名誉主任。如今,该中心已编辑出版了83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53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73卷《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等重要文献。今年4月,10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正式首发,首次以中文译本完整呈现东京审判核心文献。

纪念东京审判是要牢记血泪换来的教训

今年6月,央视新闻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

谈及此事,向隆万语气极为严肃。“东京审判结束后,日本一直没有像德国那样对军国主义进行彻底清算。40年前,日本文部省把教科书中的‘侵略’改成‘进入’;4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之风不仅没有消停,反而更加猖獗。继续把当年真相公之于众,这非常重要!”

采访结束时,向隆万引用了父亲向哲濬1983年时说过的一段话:“事实上,历史是抹杀、歪曲、篡改不了的。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又会深受其害。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硬要卷土重来,那么它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纪念东京审判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牢记血泪换来的教训,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85岁的向隆万说,“我们都要为历史作证。”

8000张“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照片入藏南京

两位捐赠者述说不同受害者一个同样的生活细节让人揪心

扬子晚报讯(实习生 张梦瑶 记者 臧磊)8月14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调查走访影像资料捐赠活动。长期深耕日军暴行调查的知名独立调查学者李晓方,《孝感日报》主任编辑、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理事晏美华,向纪念馆捐赠一批珍贵一手资料。

李晓方此次共向馆方捐赠43幅“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手印复制品,70多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照片200余张。

李晓方介绍,2005年他看到一条全国仅剩30多位“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

的消息,遂开启自费寻访行动。20余年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20余个省份,辗转日本、韩国多地,累计走访了100余位“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老人。

此次捐献照片中,一张周粉英擦身的照片十分罕见。周粉英,如皋籍,2007年4月受南京“慰安妇”幸存者雷桂英去世触动,周粉英首次公开身份。

在捐赠仪式上,李晓方披露了这张照片背后的真实故事,“我采访她的时候是在秋天,天有点凉,她突然要洗澡,我就感到惊奇,她说:我这一生啊,从‘慰安所’回来以后每天必须洗澡。”

在擦身的时候,老人对李晓方说,“你

想拍照片,可以拍几张”,于是就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无独有偶,在晏美华捐赠的影像资料中,也有一张“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擦洗身体的照片。照片主角毛银梅,即电影《二十二》中唱“阿里郎”的那位老人,原名朴车顺。上世纪40年代,她被日军诱骗至中国武汉。日本投降后,她辗转定居湖北孝感,直至2017年离世。

晏美华历时两年,以女性细腻的视角,记录下这位韩裔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证言与日常。此次捐赠的资料包括7874张照片和10段视频。捐赠仪式上,晏美华讲述多个细节,勾勒出毛

银梅老人晚年的生活状态,其中提到,毛银梅老人每次洗澡,总要反复换水、擦洗。

李晓方说,周粉英她们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但是受传统观念影响,在她们的心目中,日军留下了让她们倍感煎熬的屈辱,她们时刻都想洗净。

对于这批入藏史料的价值,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研究馆员刘广建表示:“李晓方老师20余年的田野调查,构建了一个幸存者群像样本;晏美华老师历时两年的跟踪拍摄,则提供了有代表性幸存者的个体珍贵影像档案,为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和展陈叙事都奠定了更扎实的史料基础。”